



十三經注疏 分段標點序三

周何／十三經整理工作計畫召集人

說文：「經，織從絲也。」在織布機上，縱絲爲經，橫絲爲緯；經絲在軸，緯絲在梭，穿梭來往，於是織成布匹。因此經絲在軸上排列成行，有靜止之象，緯則屬於變動不居。於是經字可以引申而爲經常、恆久之義，可以如王陽明所說的「通人物，達四海，塞天地，亙古今」的「常道」。凡是具有經久不變，經久常新的常道，足以指導人生的論著，都可以稱之爲「經」。所以道家有道德經、南華經，醫家有靈樞經，佛學有心經，儒家有詩經、禮經等，各家都有其寶貴的傳世經典。

從意識型態來看中國人的學問，可以有各家不同類別的差異；但如從歷史觀點深入追究其源頭，至少應該是「儒」、「道」二元論。其餘則是各得其一端而更加發展，形成各具特色的系列而已。自漢代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之後，儒學便成爲中國學術的

主流。影響所及，不僅溥被於中國的本土，而且澤及於韓國、日本等與中國文化有密切關係的鄰國。在今天看來，儒學已經成爲足與西方相對，屬於東方民族思想文化的表徵。

儒學典籍的流傳，最早是經孔子手訂的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樂、春秋六經。孔子當時可能是希望藉這些經過選擇的教材，來傳授其「一以貫之」的「道」給學生。其所謂的「道」，就是以「仁」爲中心的思想體系，也就是上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人文精神的累積，也正是在同樣的自然環境、民族種性和人文歷史背景之下，所孕育形成智慧的結晶。

但孔子一向「述而不作」，他只是把他所承受集結，融會貫通的思想內涵作口頭的講述，自己從未以具體的文字寫下來，因此他的學生自然會有「退而異言」，「各安其意，失其

真」的現象。所以到韓非的時候，已經是「儒分為八」的分歧局面。所謂的失真或分歧的現象，似乎並不能意味著內容變質而貶低其價值，應該可以看作是隨時吸取不同思潮的精華而壯大自我，這正是儒學經久常新，有容乃大的優點。

這種分歧的現象，這裡沒有必要依照人物或支派來敘說，然而傳道與傳經的分歧，在學術發展的路線上，都具有明顯的差異和影響。

當時能傳孔子「道」的，最先應該是曾子，曾子傳給子思，再傳而至於孟子。這一組所重者，當指心性之存養與行為之體驗。這一傳承系列，就是宋儒所謂的道統。至於傳孔子之「經」者，最先是子夏，數傳之後而至於荀子。這一組所重者，應在文獻的保存與經義的詮釋。這一傳承系列，到漢代形成了所謂的章句訓詁之學。後來有漢學與宋學之分，其區別之關鍵，即在於傳經與傳道之不同。

其實孔子曾說過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孔子不但主張「學」與「思」當兼顧，應該也會注意到「行」。除「博學之，審問之」，「慎思之，明辨之」之外，還應該「篤行之」才是。典籍的詮釋與開悟、實踐，理當合一，「經」與「道」不應分離。只因文獻可以具體流傳，而思想行為則比較抽象空泛；中間經過秦

代任法，思想行為的價值改變，「道統」因而斷絕。法家、道家的思想流行，正宗的儒家思想早已被掩蓋不彰。雖然有董仲舒、公孫弘等人的大力倡導，但這些人大多心繫爵祿，藉此以邀寵，其志不在明道，所以雖有表現，畢竟不純。然而當時訪之故老耆宿，求之古屋壞壁，所得無論是今文或是古文，其實都是「經」書文獻。可惜樂經亡佚，六經只餘五經，漢武帝立今文五經博士於學官，古文經則大抵流傳於民間。今文出於記誦，難免殘闕不全；古文由於字體不同，辨識困難。因此兩漢學者全部心力的投注，也只能整理故紙，章句訓詁而已。如鄭玄的融合今古，編注九經，足為一代大儒，也不過志在解經，而非傳道。延及魏晉隋唐，大致都是如此。適當佛教昌盛，禪宗開創直指本體的思維方式，啟發了學者的深入思考，從儒學經典裡找尋有關存養心性的理論依據，於是主張文以載「道」的古文運動興起，更帶動了宋代熱烈討論本體性命之學，重拾舊緒，接續道統，開創儒學的新面貌。此漢學宋學之分野，實則就是傳經與傳道的偏重有所不同而已。平心而論，傳經未必不能明道致用，空談論道反而會有束書不觀的流弊。而且傳經而不論道，最多是「罔」而已；論道而不以經書為依據，或流於偏執，或失之「危殆」。傳經、

明道、致用，在程序上傳經畢竟是必不可缺的基礎，所以歷代都非常重視經書的認定與流傳。

唐代於禮經（儀禮）之外加進了周禮和禮記，春秋經則以左氏、公羊、穀梁三傳並列，於是從原有的五經擴增為九經的認定。唐文宗開成年間，刻石經於國子學，又增入了孝經、論語、爾雅，合為十二經。到宋代又加進了孟子，於是才有十三經之名。歷代的解經之作也很多，起初大概都是各自獨立單行。據段玉裁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所考，北宋時才將經文與注疏合而為一，南宋時又將經典釋文拆散附入。這也說明了「十三經注疏」的定本，對各家不同的解經之作，已有過相當謹慎的選擇和過濾。尤其再經過阮元的校勘之後，於清嘉慶二十一年，由江西南昌府學開雕印行，流傳至今，自應是最完善的本子了。其內容包括：

周易正義十卷 魏王弼、韓康伯注
唐孔穎達等正義

尚書正義二十卷 漢孔安國傳 唐
孔穎達等正義

毛詩正義七十卷 漢毛公傳 鄭玄
箋 唐孔穎達等正義

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漢鄭玄注 唐
賈公彥疏

儀禮注疏五十卷 漢鄭玄注 唐賈
公彥疏

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漢鄭玄注 唐
孔穎達等正義

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晉杜預注
唐孔穎達等正義

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漢何休
注 唐徐彥疏

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晉范寧注
唐楊士助疏

論語注疏二十卷 魏何晏等注 宋
邢昺疏

孝經注疏九卷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
宋邢昺疏

爾雅注疏十卷 晉郭璞注 宋邢昺疏
孟子注疏十四卷 漢趙岐注 宋孫
奭疏

播遷來臺之後，藝文印書館於民國四十四年四月，根據此嘉慶江西南昌府學重刻宋版，影印成十六開本四合一版面之「十三經注疏」。四十五年秋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設立國文研究所碩士班，四十六年設博士班，所中規定凡研究生必須圈點精讀「十三經注疏」以厚植基礎。從此數十年間，公私立大學菁莪作育，人材輩出，國學得以重振，傳統文化賴以持續不墜者，此聖賢經傳之流傳，實有以致之。

高層次學者的養成雖屬必要，而一般國民對這些數千年固有文化的精粹，維繫國本的精神瑰寶，應有的共識與承受則更為重要。過去的刻版書籍都沒有分段和斷句，現代人已經習

慣於讀有標點符號和分段的書，因此面對這類的古書，往往會由於苦難而生畏，由於畏懼而不願接觸。再怎樣珍貴的寶藏，缺少接觸的意願，其價值自然很難讓大家認同。於是在民國七十年初，發大心願，擬訂「十三經整理計畫」，共分六大階段，第一階段的計畫即為「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」之工作。草擬初步工作體例，邀集學有專精，認真負責的十一位同仁，集會討論，共襄盛舉。七十二年初，始與國立編譯館接洽，中間後迭經波折，直至七十六年夏，曾濟群先生接篆編譯館，認為茲事重大，宜籌集經費，全力支持。於九月四日會議中始決定正式開展工作，按各書份量之多寡排定進度流程，準照議定之工作體例，依限先後提出整理之結果。其後趙麗雲女士接掌國立編譯館後，對此項工作亦極力支持，並給予最大之期望與協助。終至目前第一階段之分段標點工作已近完成，即將付印。前後將近九年的籌劃，無數心力付出，幾乎絕望，而終又敗部復活的轉折，如今眼見一部接一部地審議校訂，出書在即，內心的欣喜固不待言，而潛存的惶恐不安卻也與日俱增。因為這是一件艱鉅的工程，能夠考慮到的問題，都曾經過會商討論，設法解決；但總會有考慮不周，或因一時疏忽所造成的錯失存在，一旦出版，責任跟著就來了。

當然絕不希望因我們的疏失，對聖賢經典會構成任何價值上的傷害，因此殷切期盼各界人士不吝賜教，給予鞭策和鼓勵，讓我們能虛心地修葺補苴，再更加謹慎地開始下一階段的工作，為傳統文化中最精粹珍貴的經典，作現代化、大眾化的推廣與宣揚。

然此實一鉅大之工程，非少數人力所能辦，因邀集師大、政大兩校精英十一人通力合作，共襄盛舉，惟人多意見亦雜，故每付諸集體會議共同商量，諸如工作項目、內容、體例等，皆經多次會議議決定案，期能和衷共濟，一體遵行。然而事與願違者，每或有之。及至交稿後，余任總訂正之責，發現「周禮」、「儀禮」、「左傳」、「周易」、「論語」、「爾雅」等六書標段之體例與原商訂之體例不合，以此六書體例各異，恐來日有人詰責，無以謝責，更無力補救，經徵得編輯小組會議通過，此六書之標段工作，亦猶文責自負云爾。

又館中專司其事之陳鍾英、李素君二女士，此數年間，為此事勞心勞力，殫精竭慮，內則經費之籌措，會議之召集，外則分撥審查，招標發包，乃至稿件之校閱等協助最多，謹此致謝。

周何

謹序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